

开卷丛书

不平则鸣

唐宋八大家散文卷

张展 编著



天下有大勇者，
卒然临之而不惊，
无故加之而不怒。
此其所挟持者甚大，
而其志甚远也。



民教育出版社

开卷丛书

不平则鸣

唐宋八大家散文卷

张展 编著

天下有大勇者，
卒然临之而不惊，
无故加之而不怒。
此其所挾持者甚大，
而其志甚远也。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4 号

· 开卷丛书 ·

不平则鸣

——唐宋八大家散文卷

张 展 编著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南段 376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5.25 印张 4 插页 110 千字

1994 年 10 月第 1 版 1996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001—11,000

ISBN 7—5419—6564—2/I·300

定价:8.60 元

责任编辑

王志章

封面设计

徐未未

内文设计

姚雪琴

· 开卷丛书 · 编委会

主 编	杨匡汉	赵喜民	
副主编	汤学智	陈绪万	张德祥
编 委	赵喜民	杨匡汉	汤学智
	陈绪万	张德祥	傅美琳
	赵常安	鲁小红	田和平
	王志章	沈 斌	姚雪琴
	高光起	卢兴基	李 易
	蒋守谦	孟繁林	王保生
	贺学君	董之林	刘 纳
	吴岳添	班 澜	邓晓丽

面对绵延的高山巨灵

杨匡汉 汤学智

人生需要两种空间——物质的空间和精神的空间。作为文明之花的文学，为人类生存提供着广阔的精神空间。

人的生命如逝水，一去而不复返。惟文学与艺术，往往可以追回人们曾经有过的生命体验，或进入另一种足资向往的可能的人生。正因为如此，当你工余饭后，案前林下，一卷在手，古往今来，神游物外，可增长知识，陶冶性情，滋润生命，抚慰心灵。阅读好的文学作品，有如良师耳提面命，有如友朋品茗夜话，有如情侣倾诉衷肠，亦有如听风听雨过清明……故古人有“开卷有益，不以为劳”之说。作为一个现代文明人，企望视野的开放和精神的拓展，那就应该对文学，尤其是本民族文学，有深入的了解和体认，从而进至文明度更高的精神生活之中。

当你开卷时，你所面对的文学世界，内涵是十分丰富的和浩瀚的。

从本质论角度看，文学是入学，也是心学。它是人的生命的律动，心灵的歌唱，是人的情感和智慧孕化的产物，是人的具有无限创造潜能的本质的自由显现。文学离不开人，离不开人的内在精神。在社会生活中，凡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文学；有什么样的人群，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学；而且，只要人类还将继续生存发展下去，文学之花也一定会愈开愈鲜艳。在文学内涵中，最深

刻的便是它所体现的人的内在精神的普遍性底蕴；同时，由于任何人群、任何民族都是在特定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生成、发展和演化的，并由此铸造出与众不同的特殊的民族个性，故而文学又自然地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特殊的民族风貌和文学精神。

从本体论角度看，文学是承载生命信息的语言建构。在长期的文学积淀中，形成了由各种不同层次、不同功能的文本构成的文体系统。以文体类型而论，文学由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基本类型构成；以审美需求而论，有俗文学与雅文学之别；以创作流程而论，又有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之分。所谓民间文学，是指大多由人民大众集体创作，反映民众生活愿望，并用口头演说的形式，在人民大众中间世代相传的口头文学。所谓通俗文学，是指用通俗的书面语言形式表现大众所喜爱的生活内容的文学作品，大都流传于都市市民中间，也可称为市民文学。所谓雅文学，是指由具有丰富文化修养的作家创作，用比较高雅的艺术语言形式，表现某种比较深沉的人生体验和复杂的社会思想内容的文学作品。层次与功能不同的各种文学共生互补，相辅相成，构成了文学的百花园。每一种具体文学样式，每一部文学作品，也都有自己的灵魂与血肉。正是这些众多的“生命”，建构起文学的生命系统。

从发展论角度看，在历时方向上，文学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在共时形态上，它又包含了全世界不同民族地区，不同发展程度的文学。同时，它还是一种正在不断发生变化的活的文学，人类正在不断地把自己从现实发展中展示出来的新质注入其里。因此，我们看待文学，必须站在本民族以至全人类共同创造所积成的巨大精神财富上，既不能割断古今，也不可划地为牢，应对文学的传统予以充分的尊重，对文学的创新持宽容的器度。

《开卷》作为普及性的大型文学丛书，旨在重点介绍和阐释中华民族文学、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为有助于读者阅读，有必要对中国文学的常识，作一些说明。

伟大的中华民族，已有 5000 年的文明史。中国文学同中华民族一样，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历史发展中，汉民族文学始终居于主导的和中心的地位。早在文字发明以前，汉民族的文学就以神话和传说的形式，在人民口头诞生并流传了。像“女娲神话”、“羿神话”、“大禹传说”等等。这些独具特色、有永久魅力的上古神话传说，足以同世界上最优秀的神话传说媲美。

中国文学的发展，一般按照历史分期，划分为四个阶段：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

古代文学，上起先秦时期的西周，下至 19 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前后 3000 余年。

诗歌是产生最早、发展最充分、成就也最为辉煌的一种艺术形式。中国有“诗歌大国”之称，古代诗歌以《诗经》和《楚辞》为源头。前者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后者以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诗人屈原的《离骚》为代表，气势磅礴，想象奇特。古代诗歌发展到唐宋时期，进入黄金时代，诗人辈出，诗篇累累，形成了以律诗为标志的近体诗。宋元之间，同诗有着密切联系的两文体“词”和“散曲”，得到长足的发展，甚至分别成为宋、元时代文学的重要标志，故有“宋词”、“元曲”之说。词和曲是诗与音乐结合的产物。它们比律诗更为自由、灵活，利于传情达意。

古代文学中产生较早的还有散文。散文的源头可推先秦时期的《周易》、《尚书》、《春秋》、《左传》以及《庄子》等诸子散文。古代散文的发展有三个重要阶段。一是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百家争鸣中的诸子散文；二是唐宋时期的“古文运动”，涌现了“唐宋八大家”；三是明清时期，诸如“竟陵”、“桐城”等流派的散文，

均异彩纷呈。

古代小说出现和发展较晚，这同它长期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邪宗”有关。小说虽萌芽于汉魏六朝，唐（传奇）宋（话本）时期均有长足进步，但比较繁荣发展的局面直到明清两代才出现。这是那时城市经济发展的结果。明代主要是“拟话本”和通俗体长篇章回小说，如《水浒传》、《三国志演义》、《西游记》等，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我国第一部以描写日常家庭生活为中心的小说《金瓶梅》。以及短篇小说集“三言”、“二拍”等。这些作品的出现，标志着小说已从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小说，转向描写现实社会的寻常生活，从而进入一个新的艺术领域。清代的《红楼梦》便在这一艺术方向上，达到了古典小说的高峰。此外像《儒林外史》等等也达到了相当的艺术水平。这一时期的《聊斋志异》，虽同“志怪”、“传奇”一脉，但在对社会黑暗的揭露中，包含着对自由幸福和光明的追求，成为文言小说的翘楚。

古代戏曲的开端是元人杂剧。杂剧包括“唱”、“念”、“做”等多种戏剧样式，可谓真正意义上的艺术综合体。它最初以北京（大都）为中心，流行于北方，很快传遍全国。元、明、清时期，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剧作家和作品。如马致远的《汉宫秋》，白朴的《梧桐雨》，关汉卿的《窦娥冤》，王实甫的《西厢记》，汤显祖的《牡丹亭》，洪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等。

1840年的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从此，中华古国从政治到经济、文化，开始了急剧、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的第一个阶段，即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史称近代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也称为近代文学。

这一时期，政治上、军事上失败的现实，和西方文化的传入，使得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开始对自己国体的腐朽、文化的落后进行反思。这种反思在文学上有着明显的反映，最突出的是资产阶

级改良主义代表人物梁启超、黄遵宪等人提出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主张。在这种主张影响下，出现了《官场现形记》（李宝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吴沃尧）、《老残游记》（刘鹗）和《孽海花》（曾朴）等一批以揭露当时社会黑暗为主的“谴责小说”。同时还出现了许多进步的爱国的作家、诗人。自此以后，就其主流来看，文学与国家政治、民族命运日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中国社会和文学进入“现代”时期的标志，是发生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自“五四”运动至1949年，中国的国情十分复杂多变，这给文学以直接的影响。“五四”前后，以反对封建蒙昧主义与专制主义的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为主要旗帜。20年代至30年代中期，工农大众和知识分子随着自身的日益觉醒，要求文学更自觉地表现自己的斗争生活，并且在形式和语言上进一步要求通俗化、大众化。30年代后期开始了抗战文学时期，其中包括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文学，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文学，以东北三省为中心的沦陷区文学，上海的“孤岛”文学，以及香港、台湾地区的抗争文学。现代文学时期尽管只有短短30年，但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不仅使它彻底完成了文学采用现代语言表现现代科学民主思想的内容上的深刻转变，而且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上都对传统文学进行了积极的革新和发展，开拓了话剧、新诗、现代小说、杂文、散文诗、报告文学等新的文学体裁，从而使中国文学开始同世界文坛声息相通。这一时期，出现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沈从文、艾青、曹禺等一批具有世界影响的伟大作家。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文学，称为“当代文学”。当代文学40余年，在大陆，可以“文化大革命”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以“颂歌文学”为主潮。到文化大革命，整

个文艺园地一片凋零。粉碎“四人帮”之后，“文革”的惨痛事实，促使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得不回过头来对自己的民族和历史进行深入的反省，这就促成了“反思文学”的出现。到80年代，反思由社会角度进入人的层次，继而又深入到民族的文化心理层次，遂有“寻根文学”之问世。这一时期同时出现的，还有一些青年作家现代主义和新写实主义倾向的探索。从历史眼光看，“文革”以后的文学，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突破性的开拓和创新，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化发展态势，是新中国文学发展最好的一个时期。

在中国当代文学中还包括同一时期台湾和香港地区的文学。台港文学作为中华民族文学的一部分，在与大陆相异的特殊的人文环境中生长发展，有其明显的殊相，但同根同宗同文，其人文精神和语言风貌，却与中国文学传统命脉相通。台港地区有不少优秀的作家和作品，理应纳入“开卷”者们的视野。

中国文学又具有多民族性。除汉族外，尚有55个兄弟民族。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情况比较复杂。有些民族，如藏、蒙、维吾尔、哈萨克、纳西、彝、满、柯尔克孜等族，都有自己的文学，这些少数民族文学遗产，有不少优秀的民族作家。有些民族还出现了能以汉文写作的著名作家，如杂剧作家李直夫（满族），散曲作家贯云石（维吾尔族），杂剧作家杨讷（蒙古族），词人纳兰性德（满族），作家尹湛纳希（蒙古族）等。从总体上看，少数民族保存了大量珍贵的民族民间文化。其中影响较大的，除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等世界著名的英雄史诗外，还有维吾尔族的叙事长诗《福乐智慧》，傣族的《召树屯》、《娥并与桑洛》，彝族的《阿诗玛》，蒙古族的《嘎达梅林》，以及苗族、侗族的诗歌等。这些少数民族文学有如璀璨的明珠，与汉民族文学互相辉映，把中国文学的花苑装点得绚丽多姿。

中国文学历经了如此漫长的旅途。这片故园神州，是它丰腴的精神沃土，一代接一代地生长出文学之树、艺术之果。这世代相续、不断繁荣的文学艺术，恰似绵延的高峻山岳的巨灵，震撼着也温暖着人心与人生。我们为之自豪的还在于，中国各民族之间文化精神历来互相交流和影响，从而为文学的民族融合、艺术发展不断开辟着道路。中国文学中的民族精神始终是鲜明的、无可替代的。这也使中国多民族文学的人文精神有其极为丰富的包容性，体现出举世公认的博大深远的气象。

基于上述的认知，《开卷》丛书力图以科学的态度、历史的眼光、深入浅出的叙述，系统而又简要地向广大读者介绍中华民族文学的基本脉络和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之精萃，以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为达此目的，丛书诸卷取以“文”为主、“文”“史”结合的编著体例，既侧重精选作品和文本导读，同时对所涉及的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品类的概貌、特征、价值等进行史的分析。全套丛书共24卷，其中包括外国散文、小说、戏剧各一卷，旨在为我们提供一种参照和借鉴。编著者均为在各自学术领域里耕耘多年的老、中、青专家学者。尽管如此，这套丛书仍然难以呈示伟大祖国无比丰富与恢宏的文学景观。但愿它作为广大读者的人生伴侣，携您共同步入辉煌的文学殿堂。

1993年夏 北京

前言

张 展

这是一本唐宋散文八大家的散文选集。这八位作家，分别是唐宋古文运动的代表人物，入选的作品也是他们各自的代表作，从中既可窥知他们的文学主张，也可鉴赏他们的文学风采。这八位作家都是唐宋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对我国古代散文的健康发展，具有卓越的贡献。

唐王朝建立以后，面对的文风，是六朝以来形成的华靡的骈体文风占据统治地位。骈文的兴起，对我国文学的发展起过积极作用。但其末流，则逐渐成为一味追求辞藻音律、拘于对偶用典、内容空虚、言之无物的僵化的形式主义文体。正如李谔早就指出的：“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上隋高祖革文华书》）。可以看出，骈文已经成为表达思想、反映现实的枷锁。骈文在当时被称为“今文”，反对的作家，提出用写作“古文”与之相抗。这里所说的“古文”，就是先秦两汉言之有物、质朴流畅的散文。

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曾反对六朝文的“淫巧”，如王勃就提出，为文“宜于大者远者，非缘情体物，雕虫小技而已”（《平台秘略论》）。但他们的文章都没有彻底摆脱六朝文的束缚。正如《新唐书·文艺传序》所说的：“高祖太宗，大难始夷，沿江左余风，搆句绘章，揣合低昂，故王（勃）、杨（炯）为伯。”继四杰之后，在武后时，陈子昂首先提出文学革新的主张。他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提出，恢复《诗经》的“风雅”和汉魏的“风骨”。也就

是恢复文学密切结合现实的传统。他的文章也渐趋于古。在《陈氏集序》中，他的朋友卢藏用说：“道丧五百岁而得陈君，君名子昂，字伯玉，蜀人也。崛起江汉，虎视函夏，卓立千古，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这里，指出了他文学革新先驱“四海之内，一人而已”的地位和作用。玄宗时期，由于最高统治者喜好儒家经术，古文家在反对骈文的斗争中，把儒家的经典《六经》作为革新文学的目标和依据。萧颖士说：“仆有识以来，寡于嗜好，经术之外，略不婴心”（《赠韦司业书》）。李华也说：“文章本乎作者……本乎作者，六经之志也。”（《赠礼部尚书清河孝公崔沔集序》）代宗和德宗时，李华弟子独孤及也主张宗经，他说：“为学在勤，为文在经，勤则能深，经则可行”（梁肃《祭独孤常州文》）。他在宗经的同时，又提出文章应当师法两汉：“有以取正，其贾生（贾谊）、史迁（司马迁）、班固云尔”（梁肃《常州刺史独孤及后集序》）。独孤及的弟子梁肃主张古文家在重道的同时，还要重视文辞。他提出文气说：“文本于道，失道则博之以气，气不足则饰之以辞”（《补阙李君前集序》）。这一时期古文家又提出了文章和教化的关系问题。元结曾指出文章要“救世劝俗”。后于他的柳冕提出教化中心说。他指出：“文章之道不根教化，则是一枝耳”（《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文章本于教化，形于治乱，系于国风”（《与徐给事论文书》）。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唐代准备时期的古文运动，奠定了古文以儒家思想为依据的理论基础，那时的古文理论，与后来韩愈的理论是相同的或相近的，因而对后来的古文运动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当时的古文家写出了一批作品，突破了骈文的统治范围，取得了古文运动的初步成果，扩大了影响。但这批古文家还没有力量扭转华靡的文风。究其主要原因，正如柳冕说的，他们“虽知之，不能文之；纵文之，不能至也。”（《与滑州卢大夫论文书》）这就是说：他们虽然认识到了，但写不出文章来；即使写出文章来，也到不了好的境地。这一时期的古文运

动,只能是准备时期和过渡时期的。

唐代中期,古文运动的开展进入了波澜壮阔的高潮时期。古文运动的领导者是韩愈、柳宗元,参加者有著名作家李观、欧阳詹、刘禹锡、白居易、元稹等人。

这一时期古文运动有几个主要方面:

首先,提出“志道”“明道”,作为运动的理论基石和旗帜。韩愈反复说明,他作古文的目的是有志于古道。他说:“愈之所以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答李秀才书》)。又说:“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在《原道》中,他对“古道”作了解释,指的是:尧、舜、禹、汤、周文王、武王、周公、孔子至孟轲世代相传的道。在《重答张籍书》中简要地说:“己之道,乃夫子、孟轲、扬雄所传之道也。”柳宗元也指出:“文者以明道”(《答韦中立论道书》)。这种“志道”“明道”理论(后来在宋朝被人们表述为“文以载道”)的提出,表明他们是借助儒学复古运动的兴起来推动古文运动的发展。这一理论在于指明文和道的正确关系:第一,文和道必须结合,两者要兼备。韩愈说:“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答陈生书》)。第二,道是主体,是决定性的;文是从属,是被决定的。在韩柳的古文创作实践中,这一理论实际上可以理解为形式和内容,即艺术性和思想性的关系。

其次,把作家的品德修养提到首位。古文运动既然以儒家思想为依据,突出道的主体地位,也就必然强调作家的品德修养,以立行为本,立言为表。柳宗元指出:“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韩愈也说:“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掩;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行峻而言厉,心醇而气和;昭晰者无疑,优游者有余”(《答尉迟生书》)。这里的“实”,就是指作家的思想本质,也就是品德。实的美

好或恶劣，是无法掩盖的，有什么样的实，就有什么样的表现。人品同文品是一致的。

再次，以“不平则鸣”，作为古文运动批判现实的理论根据。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指出：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这里指明，古文运动必须紧密结合实际，古文作品必须反映社会生活（包括个人生活）中的各种不平，也就是各种矛盾和斗争。

复次，古文运动对前人传统必须继承和创新。“古文”的含义，是指先秦两汉的散文。古文运动是针对六朝以来形成的骈文而发的，它的斗争武器在思想上理论上是儒家学说，在文体上标准上是先秦两汉的散文。古文家非常努力学习。韩愈的叔父韩云卿、哥哥韩会都是有名的古文家，家学渊源。又受到独孤及、梁肃的指导，用功最勤。他自述说：“性本好文学，因困厄悲愁无所告语，遂得究穷于经传史百家之说，沈潜乎训义，反复乎句读，砉磨乎事业，而奋发乎文章”（《上兵部李侍郎书》）。又说：“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先生（作者自称）之于文，可谓阅其中而肆其外矣”（《进学解》）。柳宗元在向别人介绍自己写文章的经验时，曾指出从先秦两汉著作中汲取营养的情况。他说：“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

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韩愈和柳宗元都表明,他们继承古人成果,并不生吞活剥,为了模仿,而是以我为主,从中吸取养分,便于推陈出新。

为适应古文运动的发展和斗争的需要,韩愈主张在全面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一种新体古文。在《答刘正夫书》中表达了这个意见。他说:“或问:‘为文宜何师?’”必谨对曰:“宜师古圣贤人。”曰:“古圣贤人所为书具存,辞皆不同,宜何师?”必谨对曰:“师其意,不师其辞。”这里指出,文章的抒意,可以效法古人,文章的表现方法要自己创造。在同一文中,他解释“文之能者”说:“能者非他,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

他从两个方面建立新体古文的标准:第一,要做到“唯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即:创造各种新鲜的、富有表现力的辞汇。第二,要做到“文从字顺各识职”(《南阳樊绍述墓志铭》)。即:文字流畅通顺,具备语法规律的自然性和正确性(即“各识职”)。

韩愈所要创立的这种新体古文,就是世称的“韩文”。其特点是:“务反近体(骈文),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旧唐书·韩愈传》)。

韩愈、柳宗元以新体古文从事创作,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李翱指出:“自贞元末以至于兹(长庆末),后进之士,其有志于古文者,莫不视公以为法”(《韩吏部行状》)。韩愈也说:“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柳子厚墓志铭》)。这表明古文运动已成为广泛的社会运动。作为运动的领导者韩愈,对于华靡的文风,有“摧陷廓清之功”(李汉《昌黎先生韩愈文集序》)。韩愈死后“其言大行,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新唐书·韩愈传》)。

这次古文运动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统治 300 年的浮艳柔弱